

作為「女人的人」還是作為「人的女人」？
——《東亞摩登女孩：兩次戰間的女性、
媒體與殖民現代性》書評

杜賽男*

書名：*The East Asian Modern Girl: Women, Media, and Colonial
Modernity During the Interwar Years*

主編：Sumei Wang

出版日期：2021年

出版社：Leiden, NL: Brill

「女」人，無論身處在哪一個國度，總與時代、文化價值戮力相伴。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改變了全球政治形態，局勢危殆中的東亞歷經改革以應對國際變化的格局，在朝向現代轉型的道路上，

投稿日期：2021年8月31日；通過日期：2021年9月11日。

* 杜賽男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現就讀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班，e-mail: 110152521@nccu.edu.tw。

本文引用格式：

杜賽男（2022）。〈作為「女人的人」還是作為「人的女人」？《東亞摩登女孩：兩次戰間的女性、媒體與殖民現代性》書評〉，《新聞學研究》，151: 185-197。DOI: 10.30386/MCR.202204.0010

「女人」在媒體形塑中獲得了重新詮釋的空間。

The East Asian Modern Girl: Women, Media, and Colonial Modernity During the Interwar Years 一書由主編王淑美 (Sumei Wang) 彙整了八篇東亞學者的媒體與文化研究成果，從歷史地理學視角 (geo-historical perspective) 給出多元現代性剖面，用以破除殖民／被殖民的二元論，以從整體中把握「現代」之於東亞的時代意涵。

「摩登女孩」(modern girl)，作為二戰時期眾多力量共塑的全球現象與時新概念，是本書與全球學者對話的一個學術支點。迄今，與「現代性」相關的學術論著裡，「東亞」是鮮少論及的部分，毋寧說「東亞摩登女孩」的現代性經驗。而本書將此作為論述重心，一則從遮蔽的多元歷史中挖掘現代性的遺漏風貌；二來從文化發展的深層脈絡裡，檢視現代社會在轉型中遭遇的價值體系、各種制度，乃至人身心所具有的差異，以使讀者能在「過去」與「現在」的時空遊走中反思「現代性」的意義與價值，這可視為本書特出的學術貢獻。

在書中學者們的協力共作下，二戰時期東亞地區間的現代轉型殊異透過「摩登女孩」一一浮現。首篇王淑美從 1930 年代林輝焜於報紙上連載的小說《命運難違》中揭示了「良妻賢母」(wise mother, good wife)、「摩登女孩」、「新女性」(new women) 三種既不同又相互關聯著的現代女性形象，並肯認大眾媒體 (mass media) 在新舊交替的價值觀念和時代轉型中所承載的革新功能；林佩吟 (Pei-yin Lin) 延續著女性形象中的道德兩難議題，從諸多文學作品與報刊雜誌中，總結 1930 年代臺灣現代女性形象的建構與日本文化的深入勾連，並揭示臺灣殖民地各階層女性的困境：走出家門雖意味著進步，但也落入了不道德的邊緣，這一發現不僅呼應著 1923 年魯迅於北京女子師範學院發表的演講《娜拉走後怎樣》(What Happens After Nora Leaves Home) 的

社會問題，也折射著臺灣男性在殖民現代性中的底層掙扎與矛盾。

接續的兩章從近代韓國女性形象中探尋消費文化與資本主義（capitalism）對殖民現代性的影響。徐智瑛（Jiyoung Suh）以咖啡館店員、百貨公司的櫃員等服務業女性為視角，討論「摩登女性」在階級、種族和殖民地與大都市之間的文化實踐，爬梳處在城市空間的中下層婦女，在面對傳統與現代、正宗與贗品、帝國與本土之間的矛盾時所呈現的不安全感，也進而將自己的身體捲入到殖民風景與西方現代性的全球互動浪潮中。Jina E. Kim 則從 1930 年代的韓國「殺夫」現象著眼，從 Ch'ae Mansik's（1902-1950）偵探小說《魔女》（Enchantress）的敘事分析中，拆解身處家庭、法律等現代機構中的女性，如何通過玩轉現代城市的深層結構與消費文化，推翻各層面的控制體系，逆轉性別角色。

與此同時，戰時「國民」的意識形態也是建構女性形象的權力來源。第六章由吳咏梅（Yongmei Wu）撰寫，她關注的權力關係是中日兩國的消費資本主義與國家建設意識形態所形成的文化涵義，「美」與「衛生」作為現代性的課題之一，如何在由日本人創辦的《盛京時報》（Shengjing Times）中傳達，並與清末以來的本土國民想像調和是該文論述的重心；第七章石田あゆう（Ayu Ishida）擇取的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女性雜誌《主婦之友》（Housewife's Friend）中的化妝品廣告，其著力於化妝品廣告中的女性形象如何在產業變遷中因應戰時情勢的變化，引領日本女性的現代審美觀。

最後兩篇文章將視角轉入香港和上海。游靜（Ching Yau）從香港妓院史的梳理中發現，過去因不是漢人而受到輕視的廣東艇家女（鹹水妹），隨著香港變為條約港口和英國殖民地，使性產業的利益鏈條發生轉變：艇家女憑藉性格開放、不綁腳的特質受到英國人的喜愛，也由此帶動從事性交易的艇家女不斷地累積財富，在殖民時期吃到紅利，晉升

其在香港的社會位階。不同於游靜的史料研究取徑，陳儀芬（Ifen Chen）與孫秀蕙（Hsiuhui Sun）以符號學研究見長，她們以符號學作為探究女性形象背後意識形態的工具，轉換了歷史研究中以史料為主、文本為輔的次序，在先「文本」後史料的視角挪移中，上海月份牌廣告畫中的女性形象不再只是史料中被男性凝視「框架」的客體，也有溢出「框架」之外，鼓勵女性追求自我、建立認同的深遠意涵。

以上八篇文章可說從不同側面探究了「摩登女孩」在東亞殖民現代性中的形成過程，並導引出雜糅著大眾媒體、資本主義、殖民主義（colonialism）、民族主義（nationalism）與國家主義（statism）等諸多議題下的東亞現代轉型脈絡。

針對東亞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現代女性轉型之探查，使「現代」之於不同文化的意涵經由女性形象體現。彼時，梳著捲髮、穿著短裙、腳踩高跟鞋的東亞「摩登女孩」，幾乎是風頭無二的城市風景，但走過街頭，她們也幾乎面臨相同的問題：未來是回到家庭重拾女人妻職與母職的身分？還是和男人一樣走入社會求職？

這個困擾著上一世紀東亞女性的難題，至今給出的答案仍是難以兩全。2019 年，韓語電影《82 年生的金智英》（Kim Ji-Young: Born 1982）所反映的女性困境，與書中各章從 1930 年代文本中揭示的女性處境別無二致：深陷日常生活瑣務與道德網綁中的女人如何在自我、家庭、社會的衝突間求取平衡，探尋自我的主體性？¹ 2020 年，中國當代

¹ 韓國電影《82 年生的金智英》改編自 2016 年出版的同名小說，描述了女主角因為女性所遭遇的各種限制與差別待遇，在家庭關係中失去自己生活，也失去追尋自我的空間後，最後選擇為自己發聲的故事。這部電影反映了現代女性面臨傳統家庭觀、婚姻觀及性別角色觀中的複雜問題。影視資訊可參考 Mo, I.-y. (Producer), & Kim, D.-y. (Director). (2019). *Kim Ji-young: Born 1982* [Motion picture]. Seoul, South Korea: Spring Wind Film.

作為「女人的人」還是作為「人的女人」？——《東亞摩登女孩：兩次戰間的女性、媒體與殖民現代性》書評

作家閻連科書寫就家族裡外四代女性的命運，始終纏繞著女性犧牲、奉獻的「宿命」。如若大膽將當代寫實的女性形象與上海、日本廣告文本中透析的百年前理想女性形象做對照，則會發現：即使在女權大行其道的今日，過去雜誌廣告裡的理想女性訴求，仍未激發當代基層女性的覺醒。

為什麼現代觀念建立的近百年時間裡，女權不斷高漲但女性的生活處境卻未獲實質改善？對這一問題的興趣，讓筆者想從此書歷史文本所處的「過去」，給予「現在」社會中的人們一個檢視空間。借助書中錨定的「摩登女孩」，統合出東亞現代女性背後的權力關係是如何開展與蔓延。循此，或能從「現在」的角度理解「過去」，也能從「過去」的角度充分瞭解「現在」，進而對此書的意義與價值從現代女性轉型中增加一份宏觀的把握，也或能啟發未來女性研究的視野。

「摩登女孩」與殖民地的「現代」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因被冠以東方巴黎（Paris of the Orient）、中國好萊塢（Chinese Hollywood）而名聲大噪。類似以歐美文化為參照的現代化改造不僅有城市文化景觀，也有遊走在街頭的新女性形象——「摩登女孩」。

與同期的歐美女性相比，東亞的「摩登女孩」身處在被殖民的文化語境。戰爭的不利時局讓東亞男性菁英陷入民族危機與文化位階的恐慌，他們借助政治、經濟、教育、文化上的全面改革，掌握著新的智識與資源分配方向。此間，恪守傳統禮教的女性因著無知與幽閉成為被問題化的對象，女人在社會輿論的建構中既是社會改革的工具，也成為改革本身。正如 Prasenjit Duara（1998, p. 298）在詮釋近代「女學」動機

時指明：國族主義與父權制的結合，讓女性在傳統邁入現代中扣上了國族父權制（nationalist patriarchy）的枷鎖，所謂的女性解放並不是將女性視為主動改革的行為主體，而是將她們具化成「國家」，為使其符合特定期待而「被解放」地塑造女性。

失去定義自身的主導權，成為二十世紀東亞女性在現代轉型中面臨的共通情境。在「歐美—日本—東亞其他地域」的逐級傳播中，「摩登女孩」概念於 1920 年代從歐美最先流入日本，但它最初被賦予著「能意識到自己社會地位的年輕職業女性」的正向意涵，日本大眾媒體更將接受過教育的年輕女子作為女性雜誌發行的首要對象，家庭主婦雜誌則是遲至 1930 年代的事（Wang, 2021, p. 13），但在臺北、上海與首爾，女性在現代轉型中最先被賦予的現代理想形象卻是「良妻賢母」的家庭角色：女性可在男性的注目下「走出家門」並接受「現代教育」，這一身分的革命性不在於女性的政治、經濟獨立，而是將婦女置於家庭的中心位置，成為和丈夫同等的家庭管理者，並將自身所學的知識轉化為育兒事業。

立基於國家意識形態而對傳統性別關係的再建構，讓女人獲得合理接受教育、培養閱報習慣、參與現代城市建設的可能，但隨後而來的「摩登女孩」卻成為最具爭議的女性形象。王淑美在文章中將「摩登女孩」歸類為以自我為中心、追尋愛情、尋求身體解放，也渴望獲得物質滿足的年輕女孩（Wang, 2021, p. 12）；林嫻吟側重凸顯「摩登女孩」的職業屬性，將其圈定在服務行業中（Lin, 2021, p. 41）；徐智瑛則將「摩登女孩」比作法國城市街頭的漫步者（flâneuse），認為她們在具有經濟能力與消費能力之餘，更是新興工業城市的敏銳觀察者（Suh, 2021, p. 54）。

對「摩登女孩」概念界定的差異與模糊，恰好體現著此時女性在多

力協作轉型中的窘況：一方面，「摩登女孩」對自我的追求在某種程度上游離了男性菁英對理想女性的設定，不諳遊戲規則的「摩登女孩」被塑造為破壞女德、有違社會價值觀念、只沉迷物質享樂，無異於國家建設的例證；另一方面，印刷媒體不斷輸出著西方價值觀念，鼓勵現代女性通過參與城市文娛活動和消費文化實踐，獲得更多自我探索的空間，可無法改變父權干預也無意挑戰社會結構的女性，只能停留在身體和物質慾望層面的覺醒，難以進入政治主體性的找尋。

進退兩難的「摩登女孩」背後，深藏著東亞現代女性轉型之初的人格不完整和不自主。曖昧的身分和年齡，讓尚未走入婚姻和家庭生活中進入「良妻賢母」角色的年輕女子，能暫時規避掉一些社會責任，當她們有機會走出家門，接受現代教育和新興女性雜誌的洗禮，「摩登女孩」就有契機找尋自身。但和平行時空的歐美女性、同一文化中的母輩觀念皆不同，東亞二戰時的「摩登女孩」所面對的「傳統」與「現代」、「新」與「舊」、「保守」與「文明」等不易調和的衝突與斷裂，不僅是社會轉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正在「形成」（becoming）著的「摩登女孩」想展示自我、表達內心的欲望必須克服的障礙，在不穩定的觀念交鋒中，「摩登女孩」既要以柔弱身軀抵抗外在社會的所有齟齬，也要誠實而勇敢地解決自身觀念與行動上的衝撞，避免反覆跳躍和猶疑。

徐智瑛從消費文化中闡明，二十世紀初韓國的「摩登女孩」雖然具有職業和薪資，卻無法從當時的職業和經濟結構中過上獨立的生活（Suh, 2021, pp. 58-59）。譬如，雖然韓國咖啡館中的女店員和現代百貨公司的女櫃員都有不錯的薪資待遇，但由於她們接觸的客群階層遠超自身，而促使從事服務行業的女性願意購買、觀看和閱讀女性雜誌，用以維護和提升自己的「摩登女孩」形象。但在這場消費與自我展示中，

女性主動或被動地將自己商品化了，有些女孩為彌補自身薪資與階級消費間的落差，甚至不惜出賣身體以換取經濟上的自足，從而衍生出一系列道德倫理、拜物主義等問題。

徐智瑛將這些問題的癥結歸為性別不平等下的社會結構缺失。現代社會在發展之初，表面上給予女性工作的權力，但無論從勞動條件還是工作場所的選擇，女性都無法憑藉微薄的薪資獲得經濟上的獨立、支付獨立的生活。「摩登女孩」分身的不自主、進入社會從事勞動的不多樣，加上經濟報酬的不穩定，讓東亞女性的「新」命運也難獲真正的自由。

現代「女」人的舊枷鎖與新命運

「摩登女孩」的爭議包裹著社會資源重新分配下，男性內部的階級鬥爭、東西文化價值觀念的對撞、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底層牴牾等，但這些更為本質的殖民現代性之內在矛盾，都在「摩登女孩」的聲討中降下音量。誠如林嫻吟（Lin, 2021, p. 37）在文章中所說：女性看上去有更多機會走出家門，也能參與更多娛樂活動，但無論如何，女性都要付出比以往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代價才能生存與生活。

現代女性轉型的艱難，不只是未獲社會穩定支持的「摩登女孩」才有的困境，安心扮演「良妻賢母」的女性也有身心靈上難以調和的衝突。王淑美在分析《命運難違》時指出，因「良妻賢母」經濟上依賴男性，也無法擺脫傳統女德、宗族家長制（parentalism）和宿命論（fatalism）的束縛，使得她們在接受新式教育培育中，生發對自由的憧憬與嚮往，都只停留在內心的矛盾與掙扎，想要行動的決心在現實的掣肘下變成很難轉化成行動的理想（Wang, 2021, p. 19）。

「摩登女孩」和「良妻賢母」之外，書中也探討了臺灣文學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她們既經濟獨立，又能與父權並行不悖地開展自身的主體意識，這可說是中和「摩登女孩」與「良妻賢母」弊病的理想現代女性，但在殖民語境裡，「新女性」卻是臺灣女性在父權社會的壓制下，遙不可及的夢。林姍吟（Lin, 2021, p. 42）在篇章中舉出日治時代臺灣作家翁鬧小說《殘雪》的情節：臺灣男性菁英林春生面對著本地女性玉枝和日本女性喜美子（Kimiko）有著兩種不同標準，他認為喜美子理應在東京尋找樂趣，而玉枝就應該待在家裡。小說隱隱傳遞著對現代城市的追求只是男性知識分子的特權，可男性追尋現代的標準，卻不是考慮在地的文化或語言接受力，而是追隨日本的社會潮流和目光。《命運難違》的小說就揭示臺灣男性菁英判斷新名詞是否能在本土通用時，端看日本大眾的接受度如何，只要日本風行，那麼對於臺灣文化才是好的。

在帝國主義影響下，制式地將歐美或日本的現代模板移入自身文化的作法，使二十世紀的東亞常流於現代一元的窠臼。如同「東方好萊塢」、「中國巴黎」、moga、flâneuse 等新名詞的運用，雖彰顯著殖民地人們對現代社會的接納與渴望，卻也反襯出城市以喪失自身主體性為代價，放棄從本質意涵中思考現代觀念的深層問題，「摩登女孩」亦如是。

學術界開展的有關殖民現代性的討論，多圍繞不完整領土下的抽象之國家與民族意識形態建構、知識分子的集體心靈等「社會——人」的面向，但本書卻以「人——社會」小中見大，從殖民語境裡女人人格的不完整中，省思現代轉型過程裡的歷史遺留問題。

「性別不平等」可說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東亞女性的命運共同體。Duara（1998）從意識形態與社會結構中發現東亞「現代女性」形成的

弔詭：在維護與鞏固男權地位中解放女性。現在不妨以一則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流傳於民間的小故事展開討論：

一位小腳婦人在「查腳隊」面前，鼓起勇氣拿了一塊油炸過的乾麻花遞給政府派來的查腳員看，她說，只要查腳員能將這塊麻花解開，回復原來柔軟的麵團形狀，她就願意捨棄裹腳布，將腳放開來（Ko, 2007, p. 3）。

這則「乾麻花」事件以譬喻手法說明，女人的腳在社會革新中並不像男人的辮子，經由「剪」的動作就能直線地轉型。由於纏足造成女子雙足骨骼扭曲變形，使得放足的女性在沒有裹腳布的支撐下走路更為艱難，骨骼變形更加嚴重，這注定了女性身體的解放遠非從「纏」到「解」的一蹴而就。但為求改革成效，掌握社會轉型節奏的男性，常不顧女性身體發育的實際，打著解放女性的旗號強制要求所有女性放足，並將改革成效等同於不綁腳的人數，此間過程中女性作為個體的身體感受與思想困頓並不在改革者關心的範疇。如此標榜進步與文明的現代女性「解放」，究竟進步了什麼，文明到何種程度？又是否真的解放女性了呢？

二戰後，法國女權運動的理論家與創始人 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在《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裡寫下「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以讓人們從「性別意識」的角度注意到「女人」在外顯的角色扮演之餘，也和男性一樣是獨立存在的個體（Holdforth, 2004, p. 141），特別是1960年代末從歐美興盛起來的女性主義，一邊為女性研究開拓著可耕耘的學術版圖，一邊開展全球婦女運動，這讓女性可從理論與實務的結合中獲取定位自身的空間，如同巴黎女人，因著自信、時尚、獨立與多

元的樣態而一躍成為現代女性的楷模（同上引）。但奠基於歐美文化中，以歐美女性經驗為主導的女性理論與實務，能否指導文化迥異的東亞，會否再次落入一元現代論般的一元女性主義，又會否再此陷入標準、制式的女性改造中，是至今仍需高度反思的地方。

何去何從：探望「人」的女性研究

長期以來，對女性個體與主體的遮蔽，是東亞女性不同於歐洲女性最隱晦的現實。現代思想轉型裡女人以什麼身分進入轉型的舞臺？身為改革舵手的男性菁英首先看到的是女人為「人」的屬性？還是希望她們承擔的角色與身分？對於過去女性議題的未解，也將影響著我們思考如何解放女性的未來。

在此書有關「過去」女性的研究中，我們可辨別出三個不同的發展面向：從父權角度揭示女性被壓抑的問題；從女性主義角度討論女性顛覆父權的可能性；從文本語境與社會發展脈絡中探究女性處境。

在此期間，大眾媒體借助圖、文符號組成的歷史文本，讓我們從縱向的時空中拉開今日與過去的對話，以此追問有關女性的何去何從，但面對已日臻成熟的女性研究視角，還能有何位置有助於我們對「女性」展開理解？英國歷史學家 Edward Carr（1961/2018, p. 102）啟發我們將歷史視為一個社會過程，而人則作為參與著此一過程的社會存在（social being），這一從人和社會的流動關係中認識社會的視角，讓我們在「通往未來的過去」裡可以思考：女性歷史文本所展開的對話並不是圍繞抽象的個人與孤立的個體，而是建基在今日的社會與昨日社會的格局上。一言以蔽之，我們站在什麼樣的角度、以什麼樣的立場看待女人，不僅反映著我們的立場，也構成了一個更廣泛的問題：採取什麼觀

點來看待我們生活的社會。

二戰後，Simone de Beauvoir 對「性別意識」的敏銳洞察，是開啟女性研究，從男／女二元對立中深入性別平權討論的辦法（Holdforth, 2004）。本書對二十世紀戰時東亞女性的檢視，仍可看到「摩登女孩」牽涉出的所有衝突裡，「性別歧視」才是最為顯著的一環。無論從二十世紀上半葉東亞的現代改革中，還是二十一世紀的東亞社會，男性無疑占據著社會發展中的絕大紅利，女人則在社會結構與父權的干預下，仍要持續思考並平衡著外來和內在加諸己身的斷裂、逆反、對立與衝突。

儘管性別二元論至今仍深刻地作用於東亞文化中，但突出「男」、「女」的不同會否陷入另一組性別模具？使女性人格的完整性遭致破壞？本書巧妙地將「性別不平等」含括在殖民現代性、大眾媒體、消費文化、民族主義與父權文化共構的社會中考察，以此啟發讀者可從整體中把握現代女人在人格完整性上缺失的部分是什麼，需要找尋的是什麼。而近年來，也有突破過去性別邊界的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得以從「人」的整體性上重塑女性完整的自我（Asberg, 2017; Bove, July 19, 2021）。

在完整的自我中，激發人的自覺與能動可被視為女性掙脫既存的權力關係與社會結構的關鍵。如同近百年的纏足運動，早在 1875 年英國牧師 John Mac Gowan 創立天足會（The Heavenly Foot Society）時，就有多方力量在晚清社會中推動（Ko, 2007）。但只有女性由內而外地生發出改變的決心，被纏的足與被禁錮的思想才得以解封和翻轉，也只有讓女性於自我覺察後自主地選擇與行動，或才趨近女性主義發起的初心。

以此，給「女人」一個穩固的定位，不如將其視為一種「形成」，它不在急於求成中要求女性在一夕之間就從舊式翻轉到新式，也無需非此即彼的讓女性按照標準選邊站，順應著人在特定文化、時空內所具有

的徘徊和猶疑，我們可從動態的風貌中體察女性研究將如何在本土文化中紮根、發酵、延展與豐盈。

回到「摩登女孩」引發的思考：到底是因為女人才算做了人，還是之所以是人，才成為女人？行到尾聲或可以說：如若我們放棄黑白分明的男性、女性視野，把「她們」放回生活與生存的土地，將其視為女性的「人」和「作為人的女性」，我們不僅能看到作為人的不易，更能從不同世代的「女」人生存狀態中，窺見由生命在時間沖積下形塑出的人文天地，這將啟迪女性研究者關注到女性更深層次的思想狀態，也將引領女性研究走向更永續的未來。

參考文獻

- Asberg, C. (2017). Feminist posthumanities in the anthropocene: Forays into the postnatural. *Journal of Posthuman Studies*, 1(2), 185-204.
- Bove, T. (2021, July 19). Ecofeminism: Where gender and climate change intersect. *Earth.Org*. Retrieved from <https://earth.org/ecofeminism/>
- Carr, E. (1961/2018). *What is history?*. London, UK: Penguin Books Ltd.
- Duara, P. (1998). 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 Timelessness, gender, 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37(3), 287-308.
- Holdforth, L. (2004). *True pleasures: A memoir of women in Paris*. Melbourne, AU: Random House Australia.
- Ko, D. (2007).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California,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Lin, P. (2021). Progressive or immor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modern girl in print media of 1930s Taiwan. In S. Wang, (Ed.), *The East Asian modern girl: Women, media, and colonial modernity during the interwar years* (pp. 28-46). Leiden, NL: Brill.
- Mo, I.-y. (Producer), & Kim, D.-y. (Director). (2019). *Kim Ji-young: Born 1982* [Motion picture]. Seoul, South Korea: Spring Wind Film.
- Suh, J. (2021). Modernity through heterogeneity historicizing the modern girl in colonial Korea. In S. Wang, (Ed.), *The East Asian modern girl: Women, media, and colonial modernity during the interwar years* (pp. 46-74). Leiden, NL: Brill.
- Wang, S. (2021). *The East Asian modern girl: Women, media, and colonial modernity during the interwar years*. Leiden, NL: Brill.